

汽车和航空业成反垄断合规重灾区

■ 本报记者 钱颜

“企业违反反垄断合规会面临沉重的法律责任,如刑事处罚、监禁等。”在日前举办的企业反垄断合规风险及其应对研讨会上,众达律师事务所资深顾问薛强说。

薛强以美国为例,向企业介绍说,在美国反垄断处罚可能包括:个人长达10年的监禁以及最高金额达100万美元的罚款,公司高达上亿美元的刑事处罚(花旗银行曾于2007年被处以9.25亿美元罚款),严重的行政处罚(谷歌在2017、2018和2019年被欧盟分别处以24亿、43亿和15亿欧元罚款),强制改变商业模式,相关民事诉讼(三倍损害赔偿金),管理层身心俱疲,企业声誉受损等。

据了解,截至2017年8月,美国司法部案件中,罚金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案件共139件。

汽车和航空业是反垄断监管的重点,尤其是航空业。该行业在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罚金超过1000万美元的案例中,航空业在频繁被罚的产业中排名第二。航空企业的运营范围遍及全球,一旦违规可能导致在多个司法辖区被调查处罚。

薛强指出,垄断行为主要包括经营者达成的横向和纵向垄断协议,经

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几种情况。

横向垄断协议指的是竞争者之间达成任何有可能限制竞争的协议。薛强表示,从正式的协议到简单的信息交换均属于协议范畴。这些协议不需要相关参与企业正式认可,不需要实施,不需要产生效果。因此,没有任何信息交换渠道是安全的。例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曾对交易员利用聊天室交换信息,以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串谋行为予以调查。美国促销产品价格固定案,共谋者利用短信及其他在线信息平台达成和实施非法协议,共谋者试图使用加密通信以隐匿其合谋行为。美国司法部经常在卡特尔调查期间要求相关公司提供电子邮件。

纵向垄断协议指的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以及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企业可以建议价格,但不能要求经销商必须执行。禁止直接规定经销商的转售价格,不能以间接手段执行或影响价格,

如暂停返利、促销支持或供货,不能干预经销商的投标价格。”薛强说。

经营者滥用支配地位指的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实施的市场行为破坏了自由的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竞争者与消费者的利益。据了解,一家企业占有50%市场份额即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式是,两个经营者拥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或者三个经营者拥有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即被推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薛强表示,尽管企业可通过出示证据方式反驳经营者支配地位的认定,但其市场份额在30%以上时,仍需小心谨慎。

此外,限定交易、忠诚折扣、拒绝交易、搭售行为等也属于常见的滥用行为。

万合企业合规研究院专家郭琛指出,除了要制定完备且便于执行的反垄断合规政策,梳理业务流程、识别反垄断风险点外,企业还应在业务流程中嵌入控制措施以管控风险。首先,设置与竞争对手交往的风险防控措施。要求企业员工在与竞争对手的代表商讨任何形式的业务合作或协商合约之前咨询反垄断合规部门。反垄断合规部门应尽量提供书面意见和建

议,相关企业员工应据此执行。同时设立收集竞争性情报、进行行业比较活动的标准流程,确保员工不通过上述市场调研活动与竞争对手直接或间接地交换非公开的商业敏感信息。其次,设置与客户交往的风险防控措施。企业应建立适当的内部审核制度,确保对客户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之前必须取得反垄断合规部门的批准。通常情况下,企业会在年底制定针对下一年度的商业政策。商业政策包括涵盖所有产品、服务的市场策略。商业政策的内容将体现在与客户签订的各类业务合同中。最后,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风险进行防控。建议企业根据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的界定规则,定期对其产品、服务的相关市场范围进行评估,并根据其自行界定的相关市场的范围对产品、服务的市场份额数据、企业对该市场的支配程度、竞争对手进入该市场的难度等相关要素做深入了解,以判断特定的产品、服务是否可能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进而在制定该产品、服务的商业政策时防止出现可能引起反垄断关注的情形,如掠夺性定价、限定交易、歧视待遇、不合理的捆绑销售等。

“在1.0时代,企业服务通过数字化手段将线下工作转至线上,发挥协同网络效应,提高企业管理和运营效率。”慧点科技总裁李庆日前在2020中国企业服务年会上表示,在以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大数据为代表的2.0时代,传统的企业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目前市场的发展需求。

朗宇信息首席营销官鄢军华表示,当企业进入数字经济的大环境、驶入数字化转型的航道时,企业间的沟通逐渐由传统通讯向互联网通讯转变,企业都在强调为用户提供更高频次的互动。在这种趋势下,几乎没有厂商继续固守原有服务模式,纷纷适时开拓围绕企业需求的新型生态服务。

早些时候,用友、金蝶等企业服务提供商也全力打造自身的新型服务生态圈。2014年,阿里云携手合作伙伴召开发布会,开始入局企业级服务市场。在日前举行的2019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京东集团诠释了完整的技术布局与先进而丰富的对外技术服务,对外明确了“以零售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的集团战略定位。

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开始追赶企业服务生态潮流,大批互联网巨头迅速抢滩布局企业服务领域。根据《2019年企业服务生态发展状况研究报告》,2018年,企业服务领域的生态主为22个,潜在生态主为43个。

“目前,企业服务的焦点不只是为企业降本增效、减少成本,而是聚焦在数字化转型上。”阿里云研究中心高级战略专家崔昊认为,企业服务需要关注利用智能、智能云交互、安全的身份认证、RPA(前言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技术,更好地驱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浪潮云ERP渠道总监戚桂良称,数字化转型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是一个必经之路,新创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比较容易,但是大部分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风险和危机,可能成功,可能死掉。

“企业服务厂商要想把智能和企业业务紧密结合起来,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把底层的计算、框架、基础服务融合在一起的平台。”崔昊表示,特别是当企业前端、后端、中台业务都在云上,消费者和企业的业务合作方式都在线上时,企业的数据等也应放在一个实时准确的云平台上面。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的兴起,来自各行各业的交互数据、统计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众多企业开始选择更加安全、高性能、低成本的云服务,而且由于各厂商技术路线不同,企业采购的各类云服务需要进一步打通,企业对于“一体化服务”的呼声越来越高。

崔昊介绍说,现在,很多企业服务厂商都在开发AIOps平台。AIOps平台即利用大数据、现代机器学习和其他高级分析技术,以主动、个性化和动态的见解直接或间接地增强IT操作(监视、自动化和服务台)的功能。“这是因为企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业务、人员、IT、流程、运维都在成指数级规模增长,为了保持企业运维的高效和准确性,需要提升数据和机器学习等能力。”

李庆还表示,企业服务厂商不仅需要关注单个业务或者环节的数据化,更应关注连接。他们可通过连接企业不同场景的各种业务形成更好的赋能。例如,在企业间的合同管理上,他们可将合同与CA认证、电子签名、法律诉讼、仲裁服务全面连接在一起,这不仅仅降低了管理成本、司法成本,还可以有效地进行智能风险预警。

新型企业服务生态初露峥嵘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5G 赋能数字经济新动能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在5G基站建设方面,我国三大运营商2019年将在50个以上城市建网,2020年覆盖全部地级市,未来5G的宏基站数将与4G相当,而微基站数可能为宏基站的3倍多。”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近日在5G与数字经济新动能高峰论坛上表示,随着5G的逐渐普及,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4.3亿个5G连接,5G用户占我国移动用户数量的28%,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最大的5G市场。

邬贺铨介绍说,5G的作用就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它将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一起,以三足鼎立之势更好地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0年至2025年期间,我国5G商用将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0.6万亿元,直接创造经济增加值3.3万亿元,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310万个。

相关研究显示,到2035年,5G为全球创造的经济产出将达到12.3万亿美元,占全球实际产出的4.6%。

“5G是需求牵引加技术驱动的过程”。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首席战略官王翔表示,5G是创新的关键要素,需要通过需求牵引拉动:一是运营创新,企业需通过流程优化和组织再造提升效率。二是产品和服务创新,企业要更加看重产品技术的提升,以满足大规模定制。三是商业模式创新,5G面临传统4G流量向工业互联网转换的商业模式切换问题。

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表示,未来如果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5G不能很好地持续发展。企业也需在5G的时代研究5G收费的问题,人们愿意为恰当价值付恰当费用。如果将5G的核心比作一张网,则将来汽车行业就有一张汽车专门网络,银行有银行专门网络,高清视频等也有专门网络,不同的网络根据时延、安全等级、功耗将会以不同的网络技术来支撑,如果简单地用流量制方式,实现投资回报会很困难。“5G下一阶段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如何针对不同的客户,设计出不同的商业模式。”

科技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曦表示,5G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主要包含五个方面,分别是尽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研发下一代5G通信技术、深化5G行业应用、关注和解决5G应用中的安全问题,以及抱持开放态度进行国际合作。

工信部总经济师王新哲也认为,5G建设应加快网络部署,完善基础设施。发挥电信运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加快建成覆盖全国、技术先进、品质优良、高效运行、全球领先的5G精品网络,构建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新型信息“大动脉”。

“此外,应加快5G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融合研究,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向融合的综合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支持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重点领域开展先行先试,打造垂直行业示范应用标杆。”王新哲表示,与此同时,应需强化政策协同,优化发展环境,加强5G标准制定、应用推广、行业管理、安全保障、资源配置方面的政策协同,深入推进产融合作,培育5G高端技术人才和应用型创新人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1月21日,在2019世界5G大会的展厅里,奇安信集团展示5G时代数字城市内生安全系统。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进出口企业如何顺利通过海关认证

2019年,各地海关陆续发布了重新认证的企业名单,面对《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的认证标准和要求,很多企业陷入了迷茫:如何操作才能够符合海关的要求? 海关的具体认证标准又是什么? 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解读与官方本意不一致怎么办? 这些都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

为了帮助进出口企业更好地理解 and 执行海关认证标准,并统一各关区的执法标准,11月1日,海关总署对框架标准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并发布了《海关认证指南》。认证指南的出现,给企业还有第三方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导,也指明了资料准备及企业管理的具体方向。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景云

峰举例说,某大型外资生产型企业,在高级认证平稳过渡后,未再关注海关认证的法规要求,企业内部各项制度基本形同虚设。接到海关的重新认证通知后,企业按照海关的各项要求开始逐条准备资料,临时搭建专项小组,但由于往年均没有按照认证标准进行管理,导致公司管理层对海关认证内容了解甚少,往年内审及制度均未有效落实,最终该企业未能通过海关的高级认证。

自2015年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实施以来,很多企业认为,按照海关认证对企业各部门的管理要求来规范其自身日常进出口及生产活动,会对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造成障碍。过渡期自

动获得认证资格后,没有再对海关认证的有关要求给予重视,无法短期内补足缺失多年的管理制度和有效落实的记录,导致很多企业重新认证都以失败而告终。

海关对企业的要求是制度落实并有效执行,而有效执行的表现就是企业有记录可循。“认证指南基本每一条都会要求按照海关认证人员要求提供抽查记录。可以看出,企业保存各项制度实施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海关认证指南的要求,重新认证企业海关抽查记录的范围是自成为认证企业或者最近一次重新认证后每一年的培训等记录,也就是说,所有重新认证的企业每年都要有记录留痕,海关有权对每年留痕

进行抽查,且抽查可追溯到企业第一次认证通过之后。因此,对于一直都没有按照海关要求进行管理及内审的企业,未做到历史记录留痕很可能成为海关检查的重要扣分项。”景云峰称。

此外,海关认证现场对答非常重要。只有一直遵守海关认证规则和要求,并用该规则管理企业日常经营,深入贯彻和落实相关管理要求的企业,在应对海关现场认证访谈时才能做到临危不惧、对答如流。景云峰强调,海关官员经验丰富,若发现企业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不但会影响海关对企业的信任感,还会直接导致企业认证失败甚至降级。景云峰建议,企业应充分重视海关的

相关管理要求,提升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将合法合规经营和企业利益最大化有机结合,切勿临时抱佛脚,练好日常管理的基本功,发现漏洞及时修正,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海关认证的要求和流程虽然繁琐,但是环环紧扣,一旦有一个风险点触发将对企业整体的合规性搭建及管理体系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从进出口企业健康良性发展的角度看,保证其业务开展的合法合规性是其经营的前提条件,满足海关信用等级制度中的各项要求,可协助企业优化管理,节省管理成本,达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景云峰说。(穆青风)

第十七届“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举办

培养涉外法律人才 扩大仲裁制度影响

■ 本报记者 江南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深化中,对国际法律服务人才需求急剧扩大。”在11月22日举办的第十七届“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颁奖仪式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去年中国国内经济增量1.4万亿美元,相当于澳大利亚2017年的经济总量,但2018年我国法律服务市场规模仅达886亿元人民币,约占世界法律服务行业比重的1.2%。根据司法部统计,目前全国执业律师人数已经达到40万,其中,真正能够做到熟练处理国际法律服务业务的却不多。这说明,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缺

乏,法律界在国际舞台上“声音小”,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市场发展和进步空间巨大。

虽然早在2012年,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就研究制订了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目前共组织7批共334名律师先后赴德国、西班牙、美国、英国等国家学习交流,但是远远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涉外律师人才缺口。

为了加快培养国际化法律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贸仲委想了许多办法,也做了不少努力,“贸仲杯”可以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实践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17届的‘贸仲杯’对于在校法学院学生提高法律实践水平、提升仲裁实践能力,对于高校提高国际商事仲裁教学

水平和仲裁法课程的发展均有很大帮助,为我国仲裁法律发展储备人才队伍。”王承杰说。

据了解,第十七届“贸仲杯”于11月17日至22日在北京举办,吸引了来自全国著名高等院校的64支代表队近700名选手参加比赛,安排比赛135场,受到全国各地高校和学生团体的广泛关注,参赛队伍地域覆盖更广,赛事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队伍结构更加多元化。经过连续5天循环赛、淘汰赛、半决赛和决赛共135场比赛的激烈角逐,北京大学代表队获得冠军,华东政法大学代表队获得亚军。贸仲委将赞助冠军军队于2020年分别参加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中国香港举办的Willem C.Vis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

本次比赛邀请了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50余名中外仲裁员、教授、律师和专家担任评委,得到众多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机构的大力支持。评委们表示,自2000年创办至今,“贸仲杯”已打造成为国内仲裁赛事的第一品牌,一年一度的“贸仲杯”已成为国内仲裁法律界的一大盛事。

“贸仲委为我国商事仲裁的人才培养和国际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汇仲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蒋弘律师表示,“贸仲杯”辩论赛不仅为青年法律人提供了走向国际仲裁法律服务的舞台,也为法律界以及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经贸活动的枢纽,国际仲裁将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贸仲杯”将在其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向世界展示中国青年法律人的面貌。

王承杰表示,60多年来,贸仲委审结各类国际国内商事仲裁案件4万余件,当事人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仲委以其独立、公正和高效赢得了国内外当事人的广泛认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大背景下,贸仲委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今年,贸仲委与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中华全国律协共同举办了2019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又与40余家国内外仲裁机构共同举办了“一带一路”仲裁机构高端圆桌论坛,并发布了《“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获得了国内外仲裁法律界等各界的广泛认同。